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的象征符号、 阈限和国家认同建构

李华君¹ 窦聪颖¹ 滕姗姗²

(1.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以下简称9·3阅兵）既是一场庄严的政治仪式，又是一场盛大的媒介仪式，具有人类学、符号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层面的重要意义。阅兵中的象征符号是仪式语境中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形象的集中体现。在众多符号所营造的氛围中，仪式的阈限过程得以显现，仪式参与者就同一方向的需求达成交融的同志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是暂时的，但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政治仪式；象征符号；阈限；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D032；G2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把仪式视为一种集体性象征行为，认为仪式以符号语言的形式来表现社会生活，必定会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态（爱弥尔·涂尔干，2006：p. 8）。阅兵仪式作为一场政治色彩浓厚的仪式，是象征符号运作的最佳场域。通过象征符号的作用，仪式参与者被带入同一阈限空间，彼此间达成一种交融，而阅兵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这种交融的关系基础之上。

9·3阅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5次大阅兵，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专题，不仅首次在非国庆节举行，还特别邀请了外国军队代表参加。此次阅兵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与以往的阅兵仪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更具研究价值。

一、9·3阅兵仪式的象征符号分析

仪式是一个有组织、有意义的符号象征体系，仪式中的象征符号是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和仪式语境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论述中，象征符号大多是非语言的，他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认为象征符号包括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维克多·特纳，2006：p. 19）。我国的人类学家瞿明安在此基础上将象征符号划分为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主要类型（瞿明安，2013：p. 40）。结合9·3阅兵仪式特殊的语境，本文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和社会象征符号加以分析。

【作者简介】李华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广告系副教授，博士

窦聪颖，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广告系研究生

滕姗姗，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11&ZD024）；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管理主体间契约伦理行为的互动机理及治理对策研究”（13CGL105）。

物化象征符号指代各种人工制造的、可触摸的物质形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如国旗和国徽象征着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思想和文化，高度体现了象征符号形态的浓缩性；武器装备符号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现实强权，在此次阅兵中展示的坦克、导弹、突击车等均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且84%装备为首次展示。

行为象征符号指代规范化和非规范化的行为举动，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而且对加深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理解、认同、敬重有着不解替代的作用。如升国旗，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个庄严的仪式，但作为阅兵仪式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历年都是不可或缺的。出发路线、方队人数和正步行进步数的设计都有着特殊的寓意，队员需要在4分20秒内走完227米距离，准确走出253步。而且，在无踩点音乐的情况下，护卫队要和70响礼炮精准配合，炮响出发，炮停到位，分毫不能差，这中间还需要下台阶、转弯、上台阶。从任务开始到结束需要进行四次步伐变换，动作之复杂，达到阅兵仪式之最，足以体现升旗仪式的庄严和神圣。方阵队形和行进动作也是典型的象征符号，在此方面外国军队与中国军队有着显著的区别，展现了各自的军队风貌和民族文化。在这样的行为符号对比之下，愈发展现出铿锵有力的中国气势。

感觉象征符号包括数字、颜色、图案、音乐、标语等非语言的信息传递方式，充分体现了象征符号意义的两极性，既有表层的“感觉极”意义，又有深层的“理念极”意义。如70门礼炮、英模方队的70面旗和直升机组成的“70”字样，三个“70”都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56门礼炮呈“八”字形等距排列，意指56个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度过八年抗日战争；《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既聚焦抗战主题，又彰显时代特色，既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又反映出人民力量的强大。

社会象征符号包括制度、等级、职业、角色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是仪式权威性和有序性的体现。如在本次阅兵仪式中尤为突出的抗战老兵、抗日英烈后代和抗战支前模范，这三种角色符号是中华民族顽强性格的象征，他们在激起观众崇高敬意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集体记忆，与仪式的主题高度契合。另一个较为突出的角色符号则是“将军”，在9·3阅兵仪式中首次出现了将军领队，这些军队精英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强制力量，也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对领导人的尊敬和服从反映了权力所指的权力魅力，这对巩固政治秩序和确定领导阶层的权威性极其重要。

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组合，它对政治仪式的重要作用在于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维克多·特纳，2006：p. 48）。四种类型的象征符号交织糅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仪式。古往今来，政治仪式都肩负着政治传播的重任，9·3阅兵仪式作为一场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政治仪式，通过将象征符号进行编码的方式彰显了统治阶级的政治艺术和传播能力。然后这一符码体系经观众译码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从而影响政治秩序，稳固政治权力。政治仪式符号系统中充斥了复杂而隐晦的规则，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特殊的意指，借助其仪式性的力量营造出神圣的阈限氛围，让公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形成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政治共同体。

二、9·3阅兵仪式的阈限和交融

阅兵仪式的象征符号是一切价值产生的基础，在这些符号的集中作用下，仪式参与者暂时与日常的网络结构相脱离，因同种情感或信念被带入相同的阈限空间之中，彼此间形成交融的同志关系。

（一）人类学仪式中的阈限

人类学家范·杰内普将所有的仪式统称为“通过仪式”，并提出了仪式的三步过程论，即分

离阶段、阈限阶段和聚合阶段（维克多·特纳，2006：p. 95）。在分离阶段，仪式主体从原有的处境逃逸出去，抛弃了之前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状态；而在聚合阶段，仪式主体重新获得相对稳定的状态，带着新的社会身份或思想观念融入社会结构中。阈限阶段则是处在二者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阶段仪式主体的特征并不明晰，而是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

特纳继承并发展了杰内普的理论，对阈限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他将围绕着仪式而展开的“阈限前——阈限期——阈限后”的过渡过程视为一种“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在阈限前，即日常状态下，社会有组织、有制度、存在彼此差别和等级，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结构关系，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在阈限期，即仪式状态下，社会是一个没有组织结构，或者仅有基本组织结构，而相对而言缺乏彼此差别的社群，具有明显的反结构特性，人们暂时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能够达成平等、融洽的关系，即为一种“交融”；而当仪式结束后，社会结构得以重新建构并显现出来，人们以在仪式中获得的身份回到社会生活中。通过仪式中的反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不平等暂时消除，因而仪式强化了既定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尽管交融是暂时性的，它却为仪式后社会结构的整合提供了支持，人们之间可能就同一方向的需求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基础。

从特纳的人类学仪式观来看，9·3阅兵仪式亦呈现出强烈的结构特征。在阈限前，仪式主体，即参与仪式实践过程的将士等，都处在日常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之中，关注于自己的领域。随着阅兵仪式的靠近，将士们开始在基本与外界隔离的“阅兵村”中进行艰苦严格的排练，由于受到仪式语境单一叙事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形成明确的、共通的、神圣的目标。当仪式进入阈限期的反结构状态，他们既已与阈限前的社会场域相脱离，又未获得阈限后被赋予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处于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状态。作为这样一种存在，仪式主体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为交融的出现提供了便利条件。如预备役和女民兵这两个主要由普通社会青年组成的方队中，有的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有的是个体经营者，有的是国家企事业单位人员，有的是大学生村官，还有的是商场服务员等，在仪式的阈限阶段他们的原有的角色和身份特征都暂时消失，形成了一个称之为“阅兵将士”的共同体，他们之间没有结构差别或者仅有基本的结构差别，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关系。

在同一时空下，每个参与者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一个目标，包括观看阅兵仪式的国家领导人和现场观众，他们在仪式符号所渲染的环境中形成共同的情感体验，自发地达成一种和谐的、平等的交融关系，并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具体表征。此时，个体的能动性在群体意识的影响下被极大地弱化，使仪式意义的共享更加快捷而有效，因而仪式的阈限过程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随着仪式阈限期的结束，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重新恢复，人们带着仪式中形成的情感体验回归到社会生活中，原有的国家认同感得到进一步强化。

（二）媒介仪式中的阈限

媒介的发展加速了仪式的变迁，使得仪式整合的机制、传播的方式及发挥的作用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进而产生了以象征性符号互动为基础的媒介仪式。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媒介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原始的仪式也以新的面貌焕发出生命力。媒介通过前期的策划宣传打断观众的媒介接触和信息接收常态，创造出媒介仪式得以实现的阈限空间，来确保观众对仪式播出的关注。仪式参与者不再仅仅局限于参与仪式实践的人们，还包括那些通过各种媒介收看仪式的观众，这些观众作为一个个节点被链接入仪式的网络之中，使阈限主体被扩大化。

一般的媒介事件重点在于对事件本身的静态呈现，而媒介仪式则强调观众的动态介入和具体的实践过程，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仪式化体现。9·3阅兵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无疑是一场盛大的媒介仪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中的阈限较之微观的人类学中仪式的阈限更为广泛，并不局限于仪式的进程。在整个事件的策划、宣传、播出和收看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充斥着象征符号的身影，使得仪式是在神圣和隆重的氛围中完成的，正是这种仪式化的呈现方式，才使得仪式的阈限过程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媒介仪式中,各种媒介通过提前策划宣传创造出一个阈限空间,邀请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到仪式中来。即便大众处于相对隔绝的私密空间,仪式的氛围也会通过媒介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递给他们,淡化他们与活动本身的实际距离,使其在心理上获得与仪式实践者相同的情感体验。在仪式进行期间,媒介呈现出来的节目与日常播出情况的对比十分鲜明,几乎所有的报道都会从预订的安排中抽出一部分时段让位于这个重大事件,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人与常态生活所脱离,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表明即将到来的事件的重要性。

仪式的现场参与者毕竟有限,媒体才是将其社会效应扩大化的利器,除了传统的电视直播,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在此次阅兵仪式中也尤为凸显。央视新闻新媒体中心通过客户端、摇一摇、扫二维码等形式首次向广大网友和手机用户推送了“V观大阅兵”微视频、“网络方阵”召集令和“跟着习主席去阅兵”双屏互动观看指南等新媒体互动产品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热情,产生了极佳的传播效果;人民网与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计算和信息检索中心合作推出了“网民情绪展示”大数据策划,总阅读量高达9.7亿人次;适用于移动媒体传播的H5专题在搜狐、百度、网易、爱奇艺等网站的纪念日宣传报道中被广泛应用。这些权威、交互的网络媒体创新策划,加上网民的二次传播,使阅兵仪式演化成了一场全媒体盛宴,成为全民参与的媒介仪式。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强力运作的新媒体极大地拓展了电视直播的覆盖率、互动性和影响力,并且融合了报纸和杂志在纵深报道上的优点,使媒介仪式的阈限主体远远超出传统的人类学仪式。

在这样的双重语境下,处于阈限期的仪式参与者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分散的大众得到统一,观众之间的地位差异也被极大地淡化。此时的社会进入交替模式,成了一个没有组织结构,或者仅有基本组织结构,而且相对而言缺乏彼此差别的社群或社区,或者是地位平等的人们结成的共同体(维克多·特纳,2006:p.96)。换言之,就同一媒介事件,大众享有同等的信息获知权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在平等的、在共同交流方式下生活的动态,即在媒介仪式进行的当下,同一目标或同种信念的人群能够暂时达成交融的关系。尽管交融是暂时的,它却为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支持。通过交融,人们就同一目标或同种信念达成共识,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基础,离散的社会实现了精神的重整,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做了铺垫。

三、9·3阅兵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通常来讲,国家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构成要素的评价和情感。通过仪式的阈限过程,参与者之间达成交融的关系,国家认同的建构便得以实现。正如纳什阿兰和布莱克维尔所说,“集体的符号性活动,以仪式的形式来自我界定,加强了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群体团结,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政治方向和属于一个更大共同体的感觉”(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2007:p.316)。在传统社会,象征着神权的宗教仪式为公众提供信仰,为民族传承文化,为国家维护秩序。而在现代社会,政治仪式作为宗教仪式的代替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9·3阅兵仪式作为一场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政治仪式和媒介仪式,从搭建认同框架、建立认同关联和强化认同实质三个步骤实现了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搭建认同框架:确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传播国家形象

政治仪式是符号权利集中运作且发挥效应的最佳场域,9·3阅兵仪式通过征用大量有冲击力的象征符号,对内传递政治信息,确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对外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搭建国家认同的框架。

政治仪式和政治生活借由政治记忆的作用完成政治信息的双向传递,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王海洲,2012:p.186)。首先,政治仪式利用象征符号对政治生活中权力合法性信息进行编码。无论是政治仪式举行的地点、仪式参与者还是其他各类象征符

号，都带有合法性建构的编码规则。天安门广场作为9·3阅兵仪式呈现的地点，在这场政治仪式中既是国家权力核心的象征，也是生产权力的最佳仪式性场所。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成立开始，历次阅兵仪式都在这里举行，这里饱含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情感和国家民族认同感。一直以来，“人”作为政治权力的首要目标构成了权力的基础。从人类学仪式来看，仪式参与者包括所有在仪式现场参与仪式进程的人；而从媒介仪式来看，仪式参与者还包括通过媒体参与仪式的非现场人员。前者有着官方控制的“准入”规则，在仪式开展前，他们的身份和参与资格会被进行严格的挑选，因此最终确定的参与者具有极强的政治代表性，而后者则为政治仪式提供了广泛的政治支持。武器装备是阅兵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物化象征符号，也是特纳所述的典型的支配性象征符号，能够统一迥然不同的各个所指，在阅兵仪式这个语境下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总之，政治仪式所建立的象征体系，不仅是对政治生活的表征，更是对其基本前提即权力合法性的提炼。

然后，政治记忆对政治仪式所象征的合法性秩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结果作用于政治生活。处于阙限期的阅兵仪式所呈现出的经验性内容与日常政治生活往往存在一些差别，一般不能直接从中获得有关权力合法性的政治信息，需要从政治记忆中提取相应的情景来加以理解。如在分列式时，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来宾都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与日常新闻中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会议或者接待外宾有着显著的区别。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就会发现，从开国大典开始，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已是一项政治常识，类似的这些常识经过时间的淘洗在政治记忆中得到稳固，成为政治生活中权力合法性建构的基石。最后，被影响的政治生活继续成为新的编码源。通过这个循环往复的信息传递过程，政治记忆被不断唤起和刻写，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得到不断巩固。

除了确立权力的合法性，国家形象在搭建认同框架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全面影响力的具体表现，既有赖于本国公民的评价，又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态度。阅兵仪式的国家形象传播主要在三种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这些不同方式的政治传播中，阅兵的整个操演过程成为政治信息制造和供给的生产流水线（王海洲，2010：p. 55）。

人际传播在阅兵仪式中主要体现在阅兵首领和受阅士兵之间，阅兵式时传播的信息流从首长指向士兵，与分列式的信息流传播方向恰好相反，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两种角色的政治关系得以确定，象征性地表现了政治的权威性和秩序性。组织传播在阅兵仪式过程中往往是隐性的，党和政府是这一国家行为中重要的媒介，其目的是政治动员，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真正主体——人民——参与到国家形象传播的仪式中来。而国家形象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仍旧是大众传播，9·3阅兵仪式作为一场重大的媒介仪式，呈现出多媒介聚合效应。其现场直播以聚焦的手法持续、全面地展现出一场盛大的媒介景观，是媒介仪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新媒体时代，除了这三维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也发挥着巨大的效力，从根本上突破了空间的限制。网络媒体作为大众媒体的补充，使阅兵仪式以主动的姿态走进全球视野；又因其良好的交互性，使更多的人参与进仪式相关话题的讨论中来，扩大了三维传播的范围。

在这一认同框架搭建的过程中，媒介通过巧妙的叙事增进了民众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知，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国家生活；通过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进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归属感，使其对国家产生更强烈的认同。

（二）建立认同关联：唤起旧的集体记忆，构建新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建构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爱弥尔·涂尔干，2006：p. 495）。通过对共同的历史的再现和传承，仪式唤醒了人们对民族的共同情感，把原本分散的个体统一到群体之中。阅兵仪式所呈现的选择性集体记忆和构建的新记忆，是国家认同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的重要关联。

资源环境的变迁造成认同的变迁，人们也会集体遗忘、修正或重建历史记忆来调整可视为“手足同胞”的人群范围（王明珂，2006：p. 252）。阅兵仪式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呈现选择性记忆来关联变迁的认同。确切地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而言，历史学的真实性是其次，满足现实需要才是政治仪式所重点考虑的。这并非是完全依照人的自然记忆，而是需要通过有目的、有目标、传统化、策略性地建构，甚至是虚构，来强调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并淡化其他情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借此把历史记忆、英雄缅怀、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9·3阅兵仪式的分列式中，最先出现的就是抗战老兵和抗日英烈后代方队，这些在众多参与抗战的人群中挑选出的英雄模范代表，不仅与“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主题相呼应，同时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特定时空的回忆，认识到党和国家在今日的幸福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政治仪式经过选择呈现出一个个隐含着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往往具备历史延续性，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并且在媒介呈现中反复出现。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习近平主席阅兵时乘坐的红旗汽车和穿着的中山装、和平鸽、国旗国徽国歌等，这些文化符号并非是此次阅兵仪式中所特有的，而是在历次阅兵中都会重复出现，具备历史延续性。每个符号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都有一个或多个明确的所指，通过媒介的反复呈现，其共通性得以延续和发扬。此外，媒介的仪式化解说也是唤起集体记忆的常用手段。比如在现场直播和转播过程中，往往选取以庄重著称的新闻联播主持人担任解说员，9·3阅兵仪式选取的分别是《新闻联播》的主播海霞和《新闻30分》的主播崔志刚，他们抑扬顿挫的、如诗歌朗诵般的话语和崇敬的语气突破了时空限制营造出仪式所特有的神圣感。总之，对仪式中文化符号的选择与编排不仅是出于对受众心理与传播效果的考量，更多是为了符合现实的政治需要。

如果说政治仪式所唤起的旧的集体记忆是对历史文化的回溯，那么制造新记忆则是它对现实感的强化。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模拟、重构和定位，共同参与仪式的人们因为相同的经历又产生新的集体记忆。首先，在9·3阅兵仪式中，各种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无疑是中国当前军事实力的集中体现。通过这种对现实社会的模拟，让仪式参与者感受到中国强大的硬实力，为建构新的集体记忆提供了脚本。其次，通过对现实社会进行重构，使逐渐形成的新记忆更加印象深刻。这种重构体现在仪式的阈限过程上，处于此阶段的人们对民族情感的关注会远远超出对个人社会属性、财产荣誉的关注，甚至可能到达个人政治信仰的顶峰，这种思想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对阈限期的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人们也因此形成了更鲜明的集体记忆。最后，通过对当前现实进行历史定位，使仪式参与者形成清晰的认知，从而将事件刻写入自己的时间记忆序列里。9·3阅兵仪式与建国初期的阅兵仪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国家主权的确立，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而前者则立足于和平时代的大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是重点，因而定位在“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总之，在这个建立认同关联的过程中，政治仪式体现了其集体记忆的功能，不仅仪式本身就是对已有集体记忆的展现，还对仪式参与者建构了新的集体记忆。这种新的集体记忆建立在对当前现实的模拟和对以往历史的衔接上，表现出历史的延续性，正因如此，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才能和“国家”二字关联起来。

（三）强化认同实质：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区别“他者”

通过仪式的阈限过程，个体特征被暂时性消除，群体特征突显出来，仪式参与者之间达成交融的同志关系，彼此拥有相同的集体记忆，形成一个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在媒介构建的仪式空间里，文化和信仰得以延续，维系着阈限形成的共同体，把个体间的相互认同共同指向国家这个整体。而这种个体对于“自我”从属于某个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和建构的基础之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与国家相比，民族更倾向于是一个理想化的群体，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p. 6），“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

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p. 7）。政治仪式通过大量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强调自我身份，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媒介的集体性参与，“自我”的身份认同得到肯定，离散的社会通过仪式的阈限过程得到精神的整合，从而实现对民族国家这个高度抽象的共同体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除了集体记忆的作用之外，对于“他者”的描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种“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是相对于“他者”的差异性认知而言的，在差异中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9·3阅兵仪式对于“他者”的描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本国相区别的他国，二是与同盟相区别的敌人。

他国的体现在本次阅兵仪式中是较为显性的。除了首次邀请外军方队、代表队参加阅兵，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等30位外国领导人，法国政府代表、外长法比尤斯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此外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等6位前政要。这些都是他国的代表，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身份。一国的国家身份是对其国家特性和属性的认知与界定，在中国代表与其他国家代表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特性和属性更加鲜明地突显出来，从而使仪式参与者更加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把自己归为区别于他国的共同体之中。正因为他者的存在，主体的独特性和权威性才得以界定。除了他者的区别，“他者的认可”也作用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外国友人的参与本身就是对中国的认可，而且，外媒对这一全球性事件的报道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一性。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把报道中国阅兵的网页设置成了中国红；美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网站都分别对中国阅兵进行了图文直播；《华尔街日报》网站更是宣称：“从中国公布的出席阅兵式的嘉宾名单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诸多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这些外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认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敌人的体现在本次阅兵仪式中是较为隐性的。作为一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仪式，虽然现场并未呈现战争和敌人的场景，但二者却处处存在。战争必定有相对的敌人，但在珍爱和平的大前提下，敌人只能作为一个隐性的象征而存在。一个个英模方队的名称，一首首歌颂党国的曲目，都会使人联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历程，中华民族在浴血中团结一致，与敌人奋力厮杀，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政治仪式用“一致的敌人”来团结民众，使其产生共鸣和彼此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实现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在外部“他者”的塑造过程中，内部“他者”是被淡化的。中国有56个民族、地缘辽阔，有着特殊的“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区域的语言、文化、习俗等都存在差异。但是在政治仪式中，这些内部的差异都被淡化，转而呈现在民众眼前的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与特纳的仪式结构特征也是不谋而合的——在仪式的阈限阶段，即反结构阶段，仪式参与者的个人特性被暂时性消除，个体间的关系达到一种交融，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实现国家认同。

四、结语

阅兵仪式是象征符号运作的集中场域，通过象征符号的特殊所指，公众被带入仪式所营造的氛围之中，进入仪式的阈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差别与不平等暂时消失，达成一种平等的“交融”关系，进而通过搭建认同框架、建立认同关联和强化认同实质三个步骤，阅兵仪式完成了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具体包括确立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传播国家形象、唤起与构建集体记忆、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区别“他者”等。阅兵仪式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建立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彰显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正因如此，国家认同才得以延续。

（下转第114页）

年线下自我认同的构建、认同危机的化解只能回归到现实生活去进行。如何平衡线上与线下自我认同,避免线上自我占据整个生活的重心,如何透过游戏反思自我,发展真实世界的自我认同,是每个青少年网游玩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CNNIC, 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2015.
- [2] CNNIC, 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研究报告[R], 2009.
- [3] 桑望鑫, 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与自我同一性发展的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年.
- [4] 乔治·米德著, 赵月瑟译, 心灵、自我与社会[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
- [5] James E. Marcia, A.S. Waterman, D.R. Matteson, et al. 1993, *Ego-identity: A Handbook for Psycho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6] 方建移, 葛进平, 章洁. 缺乏范式抑或通用范式——准社会交往研究述评[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 (13), 第68-74页.
- [7] 蒲青, 虚拟社区潜水者的准社会互动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1年.
- [8] Lewis M.L, Weber R, Bowman N.D. 'They may be pixels, but they're MY pixels': Developing a metric of character attachment in role-playing video games,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08 (4): pp.515-518.
- [9] 雪利·特克(Sherry Turkle)著, 谭天, 吴佳真译, 虚拟化身: 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M], 台湾远流出版社, 2008年.
- [10] 刘泓. 虚拟游戏的身份认同——网络游戏的文化体验之反思[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 第38-42页.
- [11] 林雅容. 自我认同形塑之初探: 青少年、角色扮演与线上游戏[J], 资讯社会研究, 2009 (16), 第197-229页.
- [12] 钟智锦, 使用与满足: 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J], 国际新闻界, 2010 (10), 第99-105页.
- [13] 张广磊, 网络游戏行为偏好问卷的编制及初步应用[D], 第二军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8年
- [14] 同[12].
- [15] 魏华, 周宗奎, 鲍娜, 高洁, 游戏角色依恋问卷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5), 第597-599页.
- [16] Nick. Yee. Motivations of Play in Online Games, *Journal of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07(9): pp. 772-775.
- [17] 王利静, 大学生角色扮演网络游戏动机、角色类型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8年.
- [18] Erikson, E.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19] 侯容澜. 角色扮演网络游戏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影响[M]. 台中: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 2003年.
- [20] 同[15].
- [21] 曹殿朕. 社会角色理论对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解读[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第207-209页.
- [22] 安东尼·吉登斯著, 赵旭东, 方文译,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 三联书店, 1998年.
- [23] 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译,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

(上接第99页)

参考文献:

- [1]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第8页.
- [2] 维克多·特纳. 象征之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第19页.
- [3] 瞿明安. 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 (8), 第40-43页.
- [4] 同[2], 第48页.
- [5]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第95页.
- [6] 同[5], 第96页.
- [7] 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 政治社会学指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第316页.
- [8] 王海洲. 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再生产: 政治记忆的双重刻写[J]. 江海学刊, 2012 (4), 第186-190页.
- [9] 王海洲. 作为媒介景观的政治仪式: 国庆阅兵(1949-2009)的政治传播学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 (4), 第53-60页.
- [10] 同[1], 第495页.
- [11]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第252页.
- [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第6-7页.

their images from multi-dimensions. However, the risk of entrepreneur endorsement should be guarded against and put into the entrepreneurs' reput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ntrepreneurs shoul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public interest and highlight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s to accumulate more reputation capital.

[Key Words] entrepreneur endorsement; mutual benefit effect; risk preven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93 Symbols, Limina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 *LI Hua-jun, DOU Cong-ying, TENG Shan-shan*

[Abstract] The military parade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9·3 Military Parade) is both a solemn political ritual and a grand media ritual,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anthropology, semiology, politics,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etc. The symbol of the military parade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ritual context, and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national image. In the atmosphere created by the symbols, ritual subjects can reach "communitas" which is a characteristic of people experiencing liminality together as a result of the emergence of ritual liminality. Although the communitas is temporary, it is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ritual; symbols; liminality; national identity

100 Digital Logic and Media Convergence

· *CHEN Gang*

[Abstract] Since 2014,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he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ese social context is an expression raised in a specific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a specific context. To study media convergence, the simple application of framework in U.S. media convergence study and the thinking stays on the media change are inappropriate. The study should be conducted objectively based on Chinese social demand, to grasp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practical objective. Meanwhile, the study should b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net principles and digital logic. Thus we can clarify the true question behind media convergence.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Internet thinking; digital logic; traditional media